

欧洲汉学学会主席瓦格纳教授访谈录

R·G·瓦格纳 何休（记录：何春晓）

“欧洲汉学学会第 15 次学术年会”（Programme for the XVth Conference of the EACS）于 2004 年 8 月 24 日至 29 日在德国著名的海德堡大学举行。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学术盛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来自欧洲各国的著名汉学家和青年学者约 200 人，还有来自美国、日本、澳洲的汉学家和中国的访欧学者数十人。会议期间，出席会议的重庆三峡学院何休教授访问了欧洲汉学学会主席、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主任、汉学研究所所长 R·G·瓦格纳教授。R·G·瓦格纳教授就欧洲汉学学会的历史发展、研究特点和海德堡大学汉学研究所的研究方向及其个人的学术见解，都作了清楚的阐述。兹将这次访谈记录，作为中外学术交流的一次对话整理出来，以飨读者。记录文本未经瓦格纳教授审阅，特此说明。

被访者：瓦格纳教授 R·G·Wagner（正文简称 W）——欧洲汉学学会主席，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研究所所长。

访问者：何休教授（正文简称 H）——重庆三峡学院“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

记者：何春晓（正文简称 X）——德国科隆大学研究生。

时间：2004 年 8 月 28 日 13 点~14 点 30 分。

地点：海德堡大学汉学研究所所长办公室。

8 月 28 日 13 点整，重庆三峡学院何休教授按事先约定，来到瓦格纳教授 R·G·Wagner 的办公室外。办公室的门敞开着。

H：（站在门口招呼）瓦格纳教授，您好！我是何休……

W：（迎上前，握手）欢迎！欢迎！正等您呢，请进来这里坐（指办公桌右边的椅子）。

H: 谢谢!(就座)瓦格纳教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来,接受我的访问。我希望不至于影响您主持会务的工作。

W: 会议期间确实很忙,许多事都要亲自张罗。但您不用客气,我很高兴利用今天中午的休息时间,和来自中国的何先生谈话。

H: 那么,就请您先谈谈“欧洲汉学学会”^①和这次“年会”的大体情况,好吗?

W: 好的。“欧洲汉学学会”正式成立于1975年,迄今已有30年了。它是由最初的“(欧洲)初级汉学研究会”^②发展而来的。最初的“(欧洲)初级汉学研究会”,1948年在伦敦成立,是欧洲的一部分从事汉学工作的学者——主要是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学者,进行学术联系的一种组织。从1948年开始到1975年已走过了27年的历程,曾作出过许多贡献。新的“欧洲汉学学会”规模更大,组织更严密,参加的国家和学者人数便更多了。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际汉学研究的条件大大改善了,欧洲汉学研究也空前活跃起来。每两年召开一次的汉学学术年会,到现今年已举行了15次,基本上每一次都有一个较为集中的主题。历次的研讨论文,都已收入我们编辑出版的《欧洲汉学研究时讯》(1986—2003)和《汉学研究纵览》(1994—1998)及其网络版中,可供查阅。“欧洲汉学学会”已经发展成为欧洲汉学界进行学术交流、检阅学术成果的一种大联合组织形式。

这次年会的筹备工作进行了一年有余。在今年(2004年)3月份以前,我们共收到学术论文350篇,绝大部分是青年学者的研究文章,这符合我们注重通过“年会”培养青年研究员的指导思想。经过“学会”的审阅,提交大会发表的论文共58篇,分为10类,其余论文可在分组会上发表,大家都有自由发表和参加讨论的机会。论文涉及面十分宽广,表明了欧洲学者对汉学研究——尤其是对今日中国——日益浓厚而广泛的兴趣。这些文章我们都已经编印出来,分发给与会的各位代表,见“Programme for the XVth Conference of the EACS”^③。

① 其全称为“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② 其全称为“The Conferences of the Junior Sinologues”。

③ 文件全称: PROGRAMME for the XVth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Heidelberg, August 25-29, 2004。

何先生您得到了吗？

H: (高兴地) 得到了。你们的资料工作做得很快, 很及时、周密, 给了参会者很大的方便。

W: 我们学会的研究课题, 同(中国)国内学术研讨会的区别是: 我们不搞大而泛的题目, 我们侧重课题的具体性、非官方视觉、非主流话语。例如, 今天一个报告中就探讨了茅盾对“五四”运动的评价以及他这个思想在《子夜》中的反映。报告说, 茅盾当时(1931年前后)对“五四”是持否定态度的, 这种否定态度所表现的极“左”的意识也反映在《子夜》的创作中, 但后来的研究者却完全忽略了这一情况, 以致对《子夜》的研究并不十分全面。再有, 就是中国现有的新文学史, 都是以“五四”和新中国成立为标志来划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 我们对此也有看法: 这种划分, 似乎并不能反映新文学发展的客观实际……

H: “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那种划分, 的确不能反映新文学发展的客观实际。在中国学术界, 已经有人提出了新的观点, 并且不止一人。我在1997年出版的一部文学史论著《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就打破了按政治历史分期来划分文学史分期的所谓中国“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传统文学史框架。波恩大学 Prof. Wolfgang Kubin 顾彬教授的新著《20世纪的中国文学》^①, 还引用了那本书的史学观点。

W: 哦, 那太好了, 我还没有注意到, 这是图书发行上的问题。我没有读到那本书。我只记得在80年代, 北京有三四个人, 包括钱理群, 曾提出要打破传统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的划分, 把20世纪的中国新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 但究竟怎样看待, 却语焉不详。后来, 他们似乎又后退了, 放弃了那种说法, 自己推翻自己——这让我们觉得不可理解。

H: 这一点, 我和您看法一致。

W: 是否请您谈谈您对新文学史的观点?

^① Prof. Wolfgang Kubin 顾彬教授: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H: 可以。我认为,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 都应该统一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范畴中, 可以统称为“20 世纪中国现代文学”, 这是没有疑问的。20 世纪中国现代文学, 在突破古典主义氛围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中, 其文学思潮先后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①“世纪初叶启蒙文学新潮”阶段(1900—1916), 以启蒙主义思想和语体文对旧文学实行改良; ②“五四新文学潮流”阶段(1917—20 世纪 40 年代国统区), 进一步高扬“民主、科学”的思想旗帜, 全面宣扬启蒙主义和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 提倡“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和“个性的文学”,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③“工农兵文学潮流”阶段(1942 年后的解放区文学—1978 年前的新中国文学), 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理论纲领, 作为“从属于政治的文学”, 作家只能做“工农兵代言人”(实为主流话语和党的政策的代言人), 而失去了创作的主体性, 不再是启蒙角色的担当者; ④“改革开放新时期文学潮流”(1978—2000), 放弃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念, 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为起点恢复了人的主体性和文学的主体性, 加速了文学现代化的进程。作为 20 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曲折发展的这样四个阶段, 是很分明的。而四个阶段的总的主题, 则是彻底告别古典主义而通向文学的现代化, 故应统一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范畴之内。

W: 您的观点, 我有同感, 虽然我还未做深入的研究。80 年代以后直至目前这个阶段, 似乎有点迷乱, 您怎么看?

H: 所谓“改革开放新时期文学”, 在破除了“政治”的束缚之后, “人的文学”、为艺术的文学、现代派文学、形式主义探索文学、新写实文学、商战文学、通俗文学、趣味文学、庸俗文学……五花八门, 无所谓“主流”, 是有点令人眼花缭乱, 全凭读者去自作选择, 决定取舍。我认为这倒是很正常的现象。现在看来, 也经历三个小阶段, 每个小阶段都有审美观念和中心主题的改变。例如, 第一个阶段 1978—1984 年, 主要是在改革的背景下放弃“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念, 恢复文学创作中人的主体性和文学审美的主体性, 创作的主题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寻根文学。第二阶段 1984—1989 年, 是在开始实行开放政策的背景下, 各种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涌动以及文化寻根进一步

的深化。第三阶段 1989—2000 年，商品大潮的滚滚浊浪席卷一切，一些人理想失落，人格异化，社会腐败也滋生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是商战文学和趣味文学、庸俗文学的时髦兴起，另一方面则是诗人作家人文精神的迷失、低落和生存困境突出的表现，各种流派大融合局面开始形成……中国文学这才真正进入了与西方现代文学接近的时代……

W: 您的这一观点很有意思。我对 80 年代的文学接触较多，特别是寻根文学，成就较高。但我以为，“文革”后的文学如“朦胧诗”、“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他们使用的思想方法，只是侧重批“四人帮”，无助于社会的分析和反思，我觉得其思想价值是很有限的。不知道您的感觉如何？

H: 我们身在其中，当时读起来觉得很感动，很能引起共鸣。我们没有从西方人阅读的角度去想，去揣摩西方人阅读的感受。我至今仍是当时的印象，后来没有重新读过那些作品。您的这一看法，值得我们深思，提醒我们去重新认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思考其审美意识的缺陷与不足何在……

W: 我不过随便说说我的感受罢了。对事物的认识，总是要经过多次反复的。我们也一样，今天这样看，说不定明天就该那样看了。但总的说来，“反思”需要站在一个更高的历史高度，不能仅仅局限于批判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真正意义的“反思”或者说“反省”，包括对文学发展史的“反思”，这太重要了！

X: (有所悟) 我想插一句：在“反思”的问题上，我认为德国对“二战”的“反思”值得借鉴。“二战”后，以知识分子带头的整个德国社会，对过去的历史进行了认真自觉的“反思”：为什么发生的一切会发生？是希特勒一个人的过错吗？为什么希特勒能够让整个德国服从于他的狂妄意志？一般的德国人有没有责任？1968 年德国学生运动的起因，这就是由于父辈对历史的反省不够。引起年青一代的强烈不满而导致的。

W: 您说得对，这需要真正意义的反思，而反思是需要勇气的。普通德国人反思“二战”犯下的严重错误，而不仅仅(将“二战”)归

咎于纳粹党徒和希特勒的罪恶，这也是需要勇气的。我们获得了这种勇气，我们便主动了。

W: (接着)“朦胧诗”一代的诗人,如北岛,说他1963年就开始了自我教育。当时有所谓的白皮书、黄皮书即内部发行的文学书刊,包括《布拉格之春》的译本,这些译本是宝贵的研究资料,北岛似乎看到过,这才产生了疑问。当时苏联有“吉拉斯”修正主义,匈牙利有“新资产阶级”,中国则说是“修正主义”。可是那些白皮书、黄皮书,一般人找不到,中国的《图书目录索引》里也没有。“文革”的资料里更是没有。这对研究很不利!老舍的儿子舒乙的单位,据说有“文革”时期地下小说的原本,值得注意。我们所里收藏的“文革”资料,比起国内来还算丰富,都是第一手资料,很珍贵。此外,中国的地方志、俗文学,我们也收藏得不少,在Leiden和Berlin收藏得更多,这也是一种研究资料。但我们研究所里只收藏了老的地方志,没有收藏新编的地方志。现在中国有些地方成立了“(新)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撰新的地方志,如上海,内部出版,我们还没有收藏。民间的口述材料,没有得到反映和发表的机会,所以我们也重视民间文学和俗文学的收藏。我们也很重视网上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每天都有专人进行这一工作,这也是获取研究资料的一种途径。文本问题,我们图书馆原则上只买中文原本,不买翻译本,这是为了准确和节省有限的图书资金。我们也买了许多电子文本,容量大,可以节省书架。

H: 我已经参观了你们的图书馆,获得了很深的印象。瓦格纳教授,我还想听一听您对20世纪初叶的中国文学运动的看法。

W: 我大体同意“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整体论”的观点。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叶的中国文学运动,实际上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方向是一致的,是一个有连续性的向前发展深化的过程。我向您提供一个情况:最早可以见到的用白话中文写作的作品,是1834年欧洲传教士发表的两本小说——但那既非中国人写的,也不一定就是现代的。晚清时期,中国知识界从西方引进新思想,这才开了新风。1872年在《申报》下属的《Days and Nights》刊物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银环琐记》(近似于“今生谈”,音译)的新小说,其内容是写一个16

岁的良家女子独自去伦敦的经历；同时还发表了书评，加上了背景介绍，让读者明白此等行为在英国实属正常，这倒有点现代意识。另有史密斯氏著书批评“中国的国民性”，类似后来的鲁迅文章，是讽刺性批判性的，而非帝国主义的。在 19 世纪有多个版本流传，后来在上海也出版了，但其思想虽然现代，却不是中国人写的，不能算中国新文学。您知道最早在欧洲创作中文现代小说，并被欧洲人所熟悉的中国人，他是谁吗？

H&X: (想了一想) 这……最早在欧洲……创作中文现代小说的……中国人……

H: (猜想) 该不是给林纾提供翻译材料，并帮助林纾做口头翻译的留洋生吧？

W: (摇头) 不是。我告诉你：他是 19 世纪末在欧洲最有名的一个中国人，叫程希潼（音译），当时清朝驻巴黎使馆的公务员，一个美男子，善骑术，广交游，是当时时髦社交圈子里常见的人物。他写了 20 多本介绍中国的小说，很快就被翻译成多种欧洲文字，欧洲人都很熟悉他，但中国人并不知道。

H: 谢谢您给我提供了这样一条线索！

H: (接着) 下面，我想请您谈谈您对当今中、德文学或其他各国文学之间的交流、影响持怎样的看法？

W: 我认为，在当今，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文学，都是一种国际现象。再没有孤立的，只对本民族发生影响，而不影响别的民族的文学。具体说，我认为今天没有所谓“德国文学”，而只有“德语文学”，即用德语写作的文学。中国也一样，只有中文写作的文学，而没有狭义的中国文学。不知您怎样看？今天的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作者，都是整个世界文化和世界文学遗产熏陶出来的。各国作家相互影响。例如，现在很出名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他自己说，他年轻的时候就主要读西方的作品，他的创作就不能说是“纯粹的日本文学”。中国的很多作者也读外国文学，就连青年团，不是也读苏联的翻译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吗？50 年代，大家都晓得有个叫娜斯佳的女拖拉机手，并且许多人想学她，这影响着当时许多中国青年的理想

和追求。这还是 50 年代的事，现在开放与交流的程度就更不一样了。50 年代创办的一本叫《译文》的杂志，一直在出版发行，拥有很多的中国读者。现在的国际文化交流发达多了，情形更不同了，更开放了，今天的中国作家很难说是哪一种封闭的文化所造就的。当然，中国作品也影响西方，特别是中国古代作品，这有许多事实。在前苏联，也有很多西方译作，特别是后斯大林时代，思想空气更加自由。另一方面，前苏联和俄国也有很多作品，值得西方研究，尤其是俄国的古典作品……总之，当今文化与文学，都已成为一种国际现象。无论哪个国家的作家，都是整个世界文化和世界文学遗产熏陶出来的。

H: 的确是这样，当今世界文学已成为一种国际现象。但各个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创作，还是不是应该有他们的个性？

W: 那是当然，文学创作的个性是永远不应该被抹杀的，不然就单调了。但他们又并不是彼此绝缘的、互不相容的。这后一点同样重要。

H: 我懂得您的意思了，谢谢。我想举例说说苏联文学和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对我们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就很大。我在想，19 世纪的俄罗斯，为什么出了那么多杰出的作家和批评家？而我们相对之下，却显得大为逊色，这实在是值得深思。

W: 19 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是值得注目的。但我们的研究和思考还不够。关键是我们必须接触那些作家作品，设身处地地看看人家当时是怎么想的？用什么精神在进行创作与批评？我们能不能做到？为什么？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

H: (思考)……

W: (打破沉默)我了解到：“文革”那一代成长起来的人，在高级知识分子的孩子圈里，也有好书流传。有人告诉我，说他当时就看过《毁灭》的中译本。

H: 还不止《毁灭》的中译本，还有许多好书，许多人都有收藏，都可以看到。“文革”并不能把那些好书都毁灭掉，都搜查干净——(笑)不像某些书上写的那么厉害！那些书影响了好几代中国知识分子。例如，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就教育了好几代人，成为理想人格和生活的教科书。

H: 下面, 请您着重介绍一下海德堡汉学系的教学与研究情况, 好吗?

W: (看看表) 好的, 我只简要地说说。海德堡大学汉学系成立的历史背景是 1961 年苏联卫星发射之后, 西方各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趣日增。这期间, 各国纷纷建立了许多新的研究所, 德国在 1962—1964 年也建立了很多相关的研究所, 大学的汉学系和汉学研究所是其中之一。关于欧洲汉学发展, 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 汉学研究的主要兴趣在中国古代, 对中国现代没有多少了解。我的老师就不能说现代汉语, 只能讲古汉语; 我年轻时接受的也是文言文教育, 没有国语(现代汉语)教育。这种情况, 很不符合当时的政治需求。“二战”后, 传教士撤出中国, 西方完全失去了和中国接触的媒介, 也没有丝毫学术交流, 中国和外界的所有联系都几乎中断。当时西方对当代中国的认识和研究, 仅局限于一种军事力量的代表, 没有学术的价值。在当时的环境下, 学术研究和现实分离的状况, 是很自然的事情。这种情况, 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之前。

自改革开放以来, 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彼此之间的往来十分方便, 接触日益频繁, 交流日益深入和广泛。现在的汉学研究, 融合了古代与现代中国的研究, 学术水平日益提高。这次欧洲汉学年会所发表的论文, 和我们在会议资料中所展示的研究成果, 您已经看到了。可以说, 近 20 年来, 我们已经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和相当丰硕的成果, 在美国汉学学者面前, 也没有愧色。

海德堡大学汉学系有 3 位正教授, 5 位副教授, 20 名客座研究员(这些人的工资, 由他处出), 6 位语言教师, 30 余名博士生, 320 名在读本科、硕士生。先说我们的汉学教学: 我们目前开设的专业是“东亚史”和“语言学”。“东亚史”专业主要研究中国历史及其在世界史中的地位, 也研究日本史。“语言学”专业可以选择中文或日文, 但选学中文的学生最多, 热情最高, 由此可以看出欧洲的“汉学热”——绝大多数年轻人, 都把眼光投向快速发展的中国。我们“汉语”专业的基础课, 有语言、文学两个方面: 语言方面分为“现代汉语”和“古汉语”; 文学方面分为“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 此外还

有“中国文学研究”“中国文化哲学”和“中国法律研究”等课程。目前，我们还开办了10个月的“汉语速成班”，是专门为有一定研究能力的人学习汉语而举办的：学生1周25小时“汉语”课，另有25小时自己在家完成练习作业。汉语“速成课”的课业负担非常繁重，差不多没有个人生活的时间，但可以让学生在很短的时间内使汉语达到一个高水平。这之后他们会去中国，去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汉语水平和研究能力。从明年开始，我们要引进新的学位制度，设立有东亚专业的硕士学位，与国际接轨。

在汉学研究方面，我们的特色就是研究的多元化，各人按照自己的兴趣行事。两位女教授正在研究20世纪中国文化史、现代文学史、西方音乐和中国当代音乐发展的关系，清末报刊虚词的使用等。这是她们的兴趣所在，我们尽力提供条件。一个更贴近现实的题目是对“文革文化”的研究，我想在这方面和研究生一起做些工作，我们也有一定的条件。我个人的研究方向，是从中国古代到中世纪的中国哲学（包括儒学、佛学和玄学），还有19世纪末太平天国的宗教，清末的报刊如《申报》等及其思想宣传，我现在正在写一本这方面的书。另外，还有当代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比如“双百”（文艺方针实施）时期文人的心态与作为、新编历史剧、舞台上表现的政治斗争、刘绍棠等人平反后的短篇小说创作分析等。

我们的博士论文题目有：“三十年代佛学对中国学术的影响”“华人无政府主义者的文化活动”（华人无政府主义者在日、法、广东、上海进行活动的情况研究）。后者已经写出800多页的论文，是对华人无政府主义者的文化活动的最系统的一个展示。

我们研究所目前的研究项目有：① 法律方面——中国早期法律的发展；西汉的早期律令；中国法律用词；② 历史方面——清末至今中国社会的空间结构与及其发展；③ 文化传媒方面——报纸、杂志、互联网等媒体在社会的空间结构中的作用；④ 语言方面——探讨语言特色与翻译技巧，两者结合起来。我们的学生暂不研究专业文学，但是文学在这些领域都起着一定的作用。

我们研究所（汉学系）的图书资料，是近十多年才搞起来的。我

20世纪80年代去美国访学，直到1987年才从美国回来。1987年我刚上任做研究所的所长的时候，当时所里的图书馆只有我这间办公室的一半儿大。美国的图书馆条件，众所周知都比较好，我习惯了美国那种资料丰富的图书馆，当时我就问秘书：“我们研究所的图书馆在哪里？”回答是：“这里就是呀！”这令我深为不安。我决意要加以改变。当时在欧洲，除了伦敦以外，都没有像样的汉学图书馆。他们那个时候，也没有钱买新书。

1987年以后，我们发展很快。我想了许多办法，寻求支持，终于建成现在的规模。我们现在的图书馆，已是欧洲汉学研究的“三大图书馆”之一。我们系的图书馆有书籍、杂志、原版文史评论，计13万册，另有2000多套中国电影、2000多盘从清末至今的中国音乐，还有数据库收藏的8000多本汉学图书。我们还有互联网上的学术讨论记录，到目前我们已存有3000多万文档资料。互联网的另外一个功效，是记存中国社会的回忆，我每天都花一两个小时进行这项工作。“Cultural and Political Discussion”，这些论坛有相关部门监控，比如《南方周末》的文章被批后便被删除，我们了解这种情况，及时加以保存，以供研究。现在公开发行的杂志约有520种（不包括中国学术月刊“China Academic Journals”的电子版），我们却有4000多种，有些刊物没有公开出版的杂志刊号，有的是用书号出版的，其中有些已经中断了。我们很重视没有刊号的所谓“内部刊物”及其发表的文章，我们完全不看重是否公开发行的刊物以及刊物的级别，越是有价值的东西，也许越是出自民间。

今天就说到这里为止吧（看表）？很对不起，开会的时间到了。（此时已是14点30分，马上就要开会了，访谈就此结束。）

H：谢谢瓦格纳教授！您连午饭也没时间吃，太辛苦了。

W：不用谢！认识您挺高兴。

（R·G·瓦格纳：欧洲汉学学会主席、海德堡大学汉学系教授、汉学研究所所长。何休：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重庆三峡学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所所长）

从秦汉时期到“二战”前夕

汉学研究的历史回顾

川 水

所谓“汉学”，实际上就是关于中国的学问，直言之也就是“中国学”。而所谓汉学研究，就是外国学术界对于中国各个方面的研究。外国人对于中国各个方面的研究，渐渐地成为一门学问，这就是他们的所谓“汉学”或者“中国学”了。中国是值得研究的，不仅因为它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在世界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还因为它是一个文明古国，有上下五千年悠久的文明史，曾有过极其辉煌灿烂的时期如先秦、汉、唐、康熙时代，对世界文明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早在唐宋元明时期，就有许多外国人研究汉学，且卓有成就。近代以来，中国在各方面是落后了，东、西方没有多少人愿意学习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事物，汉学研究便相对冷落下来。但汉学研究并未停止，而是向深入方向发展了——从原来的综合性研究，转向了对语言、文学、历史等专门性的研究。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东渐”渐成大势，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五四”以后，这种情形又进一步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情况就不同了：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是近2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越来越引起西方的注目和多方面研究的兴趣。他们不仅研究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也关注中国现实的各个方面，而且还要从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去考察和认识中国发展变化的根由，汲取于他们有益的东西。有的甚至把研究汉学、学习中国的有关知识，作为实现其人生目标的最好的选择。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汉学研究正成为西方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东学西播”正成为当今世界的一种潮流。

一、中国文化对东亚文化圈的影响

处在东亚文化圈的国家，汉学研究发轫最早，也最为突出，朝鲜（韩国）、越南、日本、蒙古和土耳其斯坦，其文明的发展直接受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这些国家和民族，很早就开始他们的汉学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就。汉语在东亚文化圈内曾经享有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远非拉丁文和希腊文在西方的地位和印度梵文在南亚的地位所能比拟。从8世纪直到19世纪，大凡有素养的朝鲜人、越南人、日本人、蒙古人乃至土耳其人，都会用汉语书写，读汉语典籍。

朝鲜、越南和中国的联系很早，受汉文化影响很深。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和朝鲜的史前石棚，属同一类型。越南发现新石器时期文物，与中国西南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期文物几乎完全相同，清化出土的青铜器也和战国秦汉的青铜器也极为类似。秦汉以后，朝鲜、越南和中国的关系更趋密切：西汉时，高句丽的太子讲读中国经史，中国的铜镜、漆器、兵器都传入朝鲜，中国移民、商人还把铁农具和生产技术带到越南。东汉末，越南人士到洛阳游学，然后回交趾（越南）任太守。南北朝时，百济不仅聘请梁朝的工匠、画师，还聘请梁朝的陆诒讲授《毛诗》，朝鲜舞乐也传入中国。此后，中国很多学者流寓越南，并留下了丰富的著述。

日本从经济、文化直至典章制度，都和中国有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追索到中国秦代：日本有所谓“秦始皇遣3000童男童女东渡日本，成为日本民族的来源”的说法，自然不太可信，但中国那时无疑已知道东瀛（日本）的所在，而且设法取得联系，却是可信的。日本和中国的直接交往较朝鲜、越南稍晚，据《后汉书》载：公元57年，日本遣使来中国，汉光武帝以印为赠。18世纪在九州北部出土的“汉倭奴国王”金印得以证实。汉以后，中国的铁农具、农业生产、养蚕、织绢，先后传入日本，中国和朝鲜移民对日本生产和文化的发达起了很大的作用。曹魏、刘宋时，日本遣使来中国，携带土产品进行交流。日本3至5世纪的古坟表明：其甲冑、刀、镜、服饰，有的是中国制造，有的是日本工匠仿制。公元5世纪前期，九州地方开始使

用汉字，汉文化的影响已深入人心。隋大业三年（公元 607 年）日本派小野妹子出使隋朝，此后四次派“遣隋使”，中日关系日趋密切。到唐代，日本先后派出 19 次“遣唐使”及其随行人员，人数多时一次就达 500 余人——包括众多的留学生、学问僧和各种文化技术人员，到中国进行考察研究，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将中国的典章制度、天文、历法、音乐、美术、建筑、雕刻和重要的生产技术带回日本。日本天平时代（724—781）是唐文化输入的极盛时期。据日本学者原田淑人讲：“当时自都城、制度以至服饰，几乎使人兴起一种‘彼我如一坎’的感想。”（《正仓考古记》，日本求文堂出版）唐文化的输入，直接推动了日本的“大化革新”：在留学生高尚元理、南渊清安和学问僧空海、最澄等人的主持和鼓吹下，日本依照唐制，进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运动，涉及政治、经济、文教各个方面，使日本社会大大向前发展了一步。日本留学生吉备真备留唐 18 余年，全面考察了唐代社会，带回去许多重要的文物典籍，还利用汉字做表音的工具，并和学问僧空海共同创造了日本文字。日本古代本来就用汉字作书写的工具，吉备真备和空海决定采用楷书汉字的偏旁和草书汉字来表达日语的声音，便形成了“片假名”和“平假名”两套日语字母，从而创造了正式的日本文字，有力地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发展。日本最古老的文学典籍《万叶集》，就是在大唐时代传入日本的《诗经》的影响下产生的，其思想和艺术，如多方面描写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精神，对于民歌的重视，语汇和比兴手法对《诗经》的借鉴，健康淳朴的诗歌风格以及作为民族文学幼年期的研究价值等，都明显地表现出《诗经》的深刻影响。唐以后，中国文化对东亚文化的积极影响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上半期（乾隆时期）。直到日本的“明治维新”（1868—1873），日本才把追求进步的眼光转向西方，并迅速地实现了近代日本的富强，成了后来居上的先进国家。

蒙古族原是北方游牧民族，其游牧文化与汉文化的激烈冲突和相互影响，在汉代表现得特别突出。到了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就更多地接受汉文化的影响和改造，汉语也成为蒙古人的通用语言。与此同时，汉语也从蒙古语中吸取了一些词汇，这反映在元杂剧中。我们

的语言学，也可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自然，中国与东亚各国的交往，也促进了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丰富和发展。这是我们所熟知的。近代以来，东亚国家汉学研究的新情况，以及南亚文化圈的国家（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缅甸等国）、西亚文化圈的国家（中东国家）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与相互影响，这里就都从略了。

二、西方的中国神话与中国魅力

中国和欧洲的最早接触，据史书的记载推测，可以上溯到公元前数百年（希腊史家希罗多德和克特西亚斯均提及中国），绵延至今，已有 20 多个世纪。中国文化的西播起于何时？因史料缺乏，依稀难辨。汉朝打通了通向西域的交通，建立了与西域各国（康居、大宛、大月氏、大夏、安息等）的联系，西域又西通两河流域、地中海沿岸、雅典和大秦（罗马）——中西交往的“丝绸之路”便开始了民间最早的运行，中国文化的西播即已开始。自此汉朝先进的经济、文化和生产技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西域，再传入西方，开始对西域和西方国家产生影响。最突出的例子，便是罗马（中国史称“大秦”）对中国丝绸的极端重视与需求：罗马共和国恺撒大帝身着中国绸袍，被视为奢豪。到罗马共和国末期，贵族妇女穿中国丝绸已经习以为常，导致丝绸价格飞涨——绸价竟贵如同等重量的黄金。到罗马帝国初期，男子穿着丝绸者亦多起来，大大加重了罗马的外汇负担，提比略国王因此下令禁止，却未能收效。往后，罗马贵族更以丝绸制作帘帐、帷幕，丝绸用途日益广泛，导致对中国丝绸的极大欣赏和依赖。由于中国丝绸受到西方特殊的重视，丝绸贸易利润特别丰厚，安息商人便极力垄断中国丝绸的中转贸易，阻止中国人与罗马人的直接接触，欧洲和中国的交往长期以来都是通过中亚、波斯的中转而间接进行的。直到汉、魏、六朝、隋、唐时代，才有大秦商人借各种名义直接来中国经商，但缺乏这方面的文献记载。

但西方长期不了解中国养蚕缫丝的奥秘，对丝绸充满神秘感。就

连聪明绝顶的罗马诗人维吉尔和博学的学者普林尼，都认为“丝生于树，从树上梳摘而得，而后织成绸缎”。与此同时，西域的新植物品种、玻璃工艺和音乐、幻术等也流入中国，丰富了中国的物质文化生活。

中国唐代是中国封建经济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中国已成为亚洲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在世界上享有极高的声望；丰富多彩的唐文化，吸引了几乎所有的周边邻国，使得通往西方的陆上“丝绸之路”更加繁荣。自6世纪以来，中亚国家波斯、大食（阿富汗）始终和中国保持着友好关系，彼此的文化交流和往来频繁：中国的丝绸、绫绢和金银制造技术传入中亚，又由中亚传入西方，罗马这才知道了中国养蚕缫丝的秘密。中国医学也传入阿拉伯，对阿拉伯医学也产生了有益的影响。中国的造纸术于天宝七年（751年）传入大食（阿富汗），后经大食传入欧洲和印度，代替了欧洲价格昂贵的羊皮纸和质地脆弱的草纸，结束了印度用贝页、白桦树皮写字的时代，对阿拉伯、欧洲和印度的文化事业自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由于交往的需要和航海技术的发达，唐代还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由广州出发，途径马来半岛、斯里兰卡，进入波斯湾和阿拉伯海，从而通往西亚和欧洲。自此，中西交通更见发达。

欧洲人有目的地访问中国并留下史籍文献的，始于13世纪到蒙古帝国访问的意大利天主教使者卡皮尼（1180—1252）和随后到元朝访问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1254—1324）。卡皮尼作为天主教使者，主要是进行宗教与外交活动。出生商人家庭的马可·波罗，作为旅行家的访问游历活动，意在考察中国的风土人情和物产资源，促进东西方直接贸易。马可·波罗经地中海东岸、两河流域、伊朗和帕米尔高原，抵达元朝上都以后，深得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任元朝官吏17年，游遍中国和越南、爪哇、苏门答腊，广泛地考察了中国和东亚地区的风俗民情和物产资源。归去后口述《马可·波罗游记》，介绍中国的物产资源和风土人情，极力赞赏中国的富饶美丽富庶和建筑的雄伟，对西方国家产生了极大吸引力。此后，西方到中国来传教、旅游、经商的人，就日渐多了起来。此后两个世纪，欧洲有关中国的著述，基本上都是游记性质的。

鉴于中国的丝绸、瓷器、漆器和“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对西方文化与生活的巨大影响，西方人直到19世纪以前，对中国的物事一直处于一种崇拜之中。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了解，其实是并不深刻的，其中有许多想象和不实的成分，如欧洲人争相传说中国人制造和使用“加帆车”一事，就是十分典型的例子。西班牙人冈扎雷斯·德·门多萨（G.D.Mendoza）在的《中国大帝国风物史》（1585年出版）一书中这样记载道：

中国人最善于发明，他们有各种张帆而行的车辆，制作精巧，使用方便。许多人都看到过此物，相信不是假的。此外，还有许多印度群岛人和葡萄牙人也见到从中国进口的布匹和陶器上，绘着这种车，足见这种图像是有实际根据的。

接着，荷兰航海家林硕吞（J.H.Linschoten）在《东西印度群岛游记》（1596年）中也说：

中国多能工巧匠，从中国来的制品可以证明。他们制造并使用带帆的车辆，像船一样，也有车轮，制作十分巧妙，在田野里行走，靠风力推动，好像在水上漂行一样。

这些文献讲得更加活灵活现，致使英国诗人弥尔顿在其著名诗篇《失乐园》（1665）中，援引中国物事，也这样描写着关于中国“加帆车”的神话：

途中，它（撒旦）降落在塞利卡那^①
那是一片荒原，那里的中国人推着
轻便的竹车，靠帆和风力前进。

中国的“加帆车”这种纯属想象的东西，在16、17世纪之交，却深深地抓住了欧洲人的心，使他们坚信不疑。这种兴趣一直延续到19

① 塞利卡那，意为丝绸之国——中国。